

南浔古镇史料研究

叶美芬著

上海遠東出版社

南浔古镇史料研究

叶美芬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浔古镇史料研究/叶美芬著.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8

ISBN 978 - 7- 80706 - 797 - 9

I. 南... II. 叶... III. 乡镇—史料—研究—湖州市
IV. K29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130488号

责任编辑: 戴 铮

南浔古镇史料研究

著者: 叶美芬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357号

邮编: 200336

网址: www.ydbook.com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印刷: 湖州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装订: 湖州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 2008年8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字数: 208千字

印张: 9.625 插页4

ISBN 978 - 7- 80706 - 797 - 9/K · 92 定价: 8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 021-62347733-8555



序（一）

我的祖籍虽是浙江绍兴，但父亲已迁居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南浔区），所以出生于南浔镇，并在镇上入学，到小学六年级转学上海。我在南浔仅生活了十一年半，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过，从我出生的1945年底至1957年7月，正是这座七百多年历史的古镇沧桑巨变中一段艰难的岁月。例如，我童年最早的记忆，是1949年春某日凌晨，我从母亲身边惊醒，发现满屋子都是人，两个闯入房内的陌生人说了几句话就不见了。大人要我们继续睡觉，我却怎么也睡不着。长大了我才知道，那是在国民党军队撤离南浔时，沿街的邻居怕不安全，而我家不靠街，还有一个小小的“墙门”和厚实的高墙，所以大家临时住在我家，将“墙门”堵死，用梯子爬墙出入。那天两名败兵不知从哪里闯了进来，惊动了两间房内的全部住客。幸而两名败兵急于逃命，只索要一身便服替换身上的军装，得到满足后就匆匆离去。我的第二个记忆，是不久后南浔解放，某日晚上举行“提灯会”庆祝，父亲给我扎了一只五角星的灯，里面点上蜡烛。就在我高高兴兴提着灯，在门口宝善街上看游行时，蜡烛烧着了灯壁纸。那时我三岁半，要不是那两次的经历并非日常生活，大概我也不会记住。



序（一）

南得古镇史料研究

我家的特殊地位，注定了我对南得的印象不可能正面，更不会全面。我父亲在抗战前从故乡到南得一家银楼当学徒，因为举目无亲，认了一位同乡女银楼主为“干娘”，父亲方面我们只有这一门并无血缘关系的亲戚。我的外祖父母也是外来移民，外公从徽州到南得当米店学徒，以后自己经营米店。外公抗战期间就已去世，外婆、舅公一直开小米店为生。本来我家还能维持小康，但解放后浙江省禁止私营银楼和金银首饰加工，父亲失业，以后不得不去上海谋生。到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外婆家的小米店关了门，也无力再接济我们。当时，我除了维持温饱不敢有任何奢望，开学时交不出学费是常有的事。要不是老师念我成绩尚好，每每宽限，舅父雪中送炭，早已被逐出教室了。

2

我能接触的人——长辈、亲戚、同学、同学的家长——大多属底层市民，个别是小学教师，他们对南得旧时的回忆只限于市井层面，精英阶层的情趣他们不理解，而对“四象八牛七十二条狗”之类巨商富贾的生活也是雾里看花，半是传闻，半是想象。听得最多的还是外婆的絮絮叨叨，大多不知重复了多少遍，无非是南得昔日如何繁盛，富裕的邻居如何阔绰，大户人家如何奢侈，还有就是舅父被太湖强盗“拔财神”（绑架家中当家人或独子后索取高额赎金）后花掉了多少钱。由于与现实反差太大，尽管听了一遍又一遍，我还是将信将疑。到我转学上海后，随着对大城市生活的适应，南得的童年生活愈行愈远。偶尔回去，发现印象中宽阔的“大街”竟如此狭窄，老宅竟如此破旧，市面又如此萧条，更觉得老人们的说法无非是夸大其事。



可是当我从事历史地理和中国史研究以后，南浔却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魅力和价值。我的师长和同行，无论是大陆的，还是港台的；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欧美；凡是涉及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农业史、近代史、江南区域史、上海史等等，鲜有不知道南浔的。近年来，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中，对南浔感兴趣的也不少，好几篇论文都涉及南浔，或者以南浔的史料为论据。我不止一次陪同国内外学者到南浔考察，最多一次去了十多位，还有人以未能成行而遗憾。连我这个出生在南浔的人也被刮目相看，一位日本学者在介绍我时，特别强调我生于南浔。还有人对我说：“怪不得你知道那么多，原来你是南浔人。”似乎南浔人都会与“四象八牛”有关，却不知道我家连“狗”的边也沾不到。

已故著名史学家唐长孺教授是江苏吴江平望镇人，但常在舅父刘承干家生活，并在南浔中学当过历史教师。建国后，作为共产党员的唐先生为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绝口不提这段经历和这层关系。实际上南浔一直萦绕于唐先生心头，改革开放后就不再有任何顾忌。1981年夏，我随侍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在京西宾馆开会，前后二十余天。唐先生参加同一会议，当他得知我生长于南浔时，情不自禁地问道：“土地堂前面还热闹吗？”有几次，他坐在走廊上的电视机前（那时房间里还不放电视机）看京戏，一见我走过，就拉我聊南浔。有时先师忍不住说：“你以为他多大年纪？这些老话他怎么知道！”其实，唐先生告诉我的更多。我明白，这是他在倾诉几十年间被压抑的情感，恢复被强制中断的记忆。有类似经历和情感的何止唐先生一人！



序（一）

南浔古镇史料研究

随着史学界和学术界的思想解放，人们才发现，南浔与中国近现代史的关系竟如此密切，出自南浔的人物在中国社会各方面曾经起过如此大的作用。当近代上海的历史越来越引人注目时，人们又发现，原来南浔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当初在上海滩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到茅盾回忆录中提到的商务印书馆的茶房，原来都是南浔人。杭州西湖博览会的恢复自然会提醒世人，它的创始人正是时任浙江省主席的民国元老——南浔人张静江。上海为迎接2010年世博会而发掘出中国最早参展世博会的商品时，曾经名闻中外的南浔名产“辑里丝”重新进入国人的视野。

与南浔丰富而辉煌的历史相比，现有的研究成果远远不足，既有深度又有可读性的文字也还难求。学术界的研究大多限于个案，或将南浔的有关史料当作论据，缺乏专题性、综合性的研究，普及读物自然只能有所选择，兼顾读者兴趣。如果说，其他镇级单位的研究大多会感到资料不足，那么南浔的困难倒是史料富余，难在收集选择。

《南浔镇志》就有好几部，多的有数十卷。个人著作或在其他著作中涉及的极多，尚未著录的史料更出乎人们意料。例如我一位学生在调查中发现一件上世纪30年代南浔教师带领小学生做的社会调查，项目几乎覆盖社会各个方面，精确性不在专业水准之下。

所以，当我在屏幕上读了叶美芬女士《南浔古镇史料研究》一书的第一章后，就不忍关机。读完全书，我证实了不少原来模糊的印象，纠正了一些已经形成的误解，也获得了新知。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作者对资料的来源都注了详细的出处，包括那些尚未正式出版的档案、调查报告



和内部资料。作者还留意收集了不少珍贵的口碑资料和照片。所以，无论是今后进一步了解南浔的历史，或者为了研究南浔的某一方面、某一阶段，基本的史料或线索已经齐备。另一方面，本书也可以作为一部简明的南浔镇史来读，便于读者在短时间内了解南浔昔日的各个方面——有些往往为其他论著所忽略。

当然，就学术研究而言，本书的某些方面略显不足。但既然作者的目的在于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为了解南浔历史提供便利，那就不必苛求了。

葛剑雄

2008年7月



序(二)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叶美芬副教授花了多年的一个研究成果。

就我所知，该研究起缘于2003年我与乡前辈、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一起筹备“江南市镇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当时，章先生前往湖州职技院作了有关这方面的一个学术讲座，尔后，章先生就此课题对大家作了理论上之启发，于是作为此课题研究的部分指导，我和作者才有了几年的学术之缘。今天，当此研究成果完成之际，我确为之高兴。当然，我是没有资格为这样一部沉甸甸之大著《南浔古镇史料研究》来撰写序言的，但数经推辞，叶美芬老师还是力邀我为之，我想究其因，大约还缘于我对那块土地有些感情、有所研究，再则，乃因我曾写有《嘉业南浔》（江苏教育出版社版）、《张静江传》（湖北人民出版社版）两部拙著之故。

南浔，这块有着一千多年历史之古老土地、又有着百年来在现代史上拥有着非常辉煌的中国丝商群体崛起之地，我始终认为，应有人为她写一部丰碑式的全视角的历史著作。而这样的任务，由叶美芬老师负担起来了。她工作很忙，既有行政职务又有教学任务，但终于花了三年多时间，把这部著作完成。当她把这部书稿让我细读之后，



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作者的审视角度，始终是在寻觅着江南一隅之地，她千年来的盈育、发展与兴盛的历史。如果说《南浔镇史》首次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江南市镇发展的历史，那么此书作者更告知了我们：作为一个江南小镇，它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在其发展上，在世界乃至全国，究竟是达到了怎样的一个高度。

我曾读了许多地方史，一直觉得，很多写地方历史之作者，总是把政治历史，山川沿革，教育文化，章章节节熨排得很是妥帖，似天衣无缝，俨然犹如同一个版本之地方通史，但却读不到任何有启示、有棱角、有新意之突破，真正能读到有价值的东西很少，这就是花架子、只求统一之模式，这种现象，确值得引起我们的研究和重视。而我认为，读叶美芬的这部《南浔古镇史》，却没有如此之感觉，它完全突破了我通常所见之地方史的框架。总而言之，我读到的不是一般古镇史之“窄面条”。无论在资料收集的广泛性上，某些定论之宽广包容性上，以及在列表叙述的细致性方面，它完全超出了我们通常所习惯的一部地方镇史之研究范畴。

“历史是具体的、生动的，应该有着它传承之生命力。”一部古镇史，无疑应由一些具体的人与物、现实之场景、事件和史实所构成。叶美芬撰写的这部书，我认为达到了作为一部古镇史研究之要求。该书以江南市镇经济、古镇社会发展史以及一个江南小镇的民俗史为经纬，在其思想观念、演进发展上，使用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国内外难得之档案、文献典籍，以江南市镇史一千多年来之发展为轨迹，涵盖了南浔独有的人文、地理、风土、人物等现场细节，其视野开阔，有很高的学术人文的参考价值，



序（二）

南浔古镇史料研究

同时，也是近期出版界一本颇值一读的好书。

当然，对于南浔镇的研究，国内外专家学者可谓仁智互见，如何把文献分析与实地调查相结合，如何以“民俗乡例证史，实物碑刻证史，民间文献证史”，做得更深更细，于此，我相信在叶美芬老师这第一本《南浔古镇史料研究》之基础上，将祈盼有更多的热爱这片土地的专家学者，会走向历史现场，写出更为精深的古镇史，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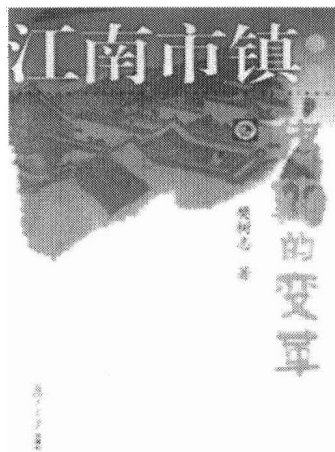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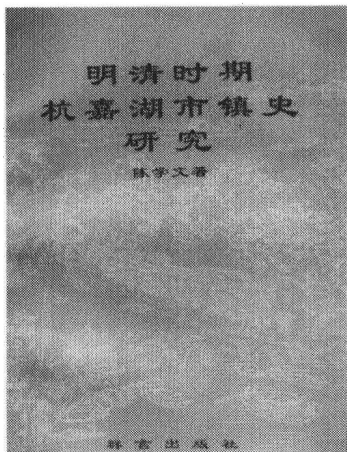
张建智

2008年7月28日



绪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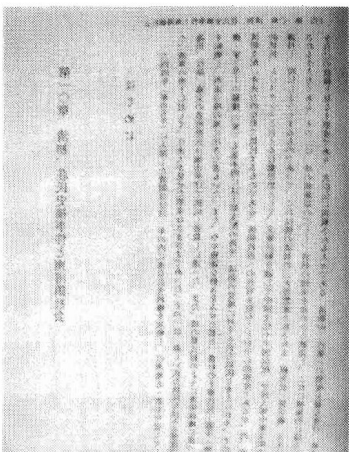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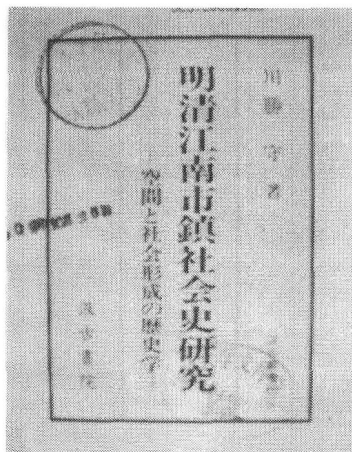
现代意义的江南市镇史研究，肇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1964年，傅衣凌先生发表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可视为江南市镇研究的开拓性成果。而较早涉及南浔镇个案研究的学者是刘石吉、陈学文和樊树志。台湾学者刘石吉在1970年发表的《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后收录于《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一文中，将南浔镇作为专业蚕桑丝织市镇进行个案研究，重点考察明清时期南浔的商业化与都市化过程。浙江学者陈学文和复旦大学教授樊树志于1988年分别





发表了《明清时期南浔镇的社会经济结构》（《浙江学刊》1988年第1期）和《南浔镇与湖丝贸易》（《学术月刊》1988年第1期）。陈文对南浔镇的研究更具有综合性，回溯了南浔镇发展历程，分析了发展原因，较详细地解析了明清时期南浔镇的经济结构，同时也论述了市镇格局与设施、人口构成、社会组织和文教事业等社会文化史内容，此文后收录于陈学文所著《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年）一书。樊文则以湖丝贸易为主线来论述南浔镇的兴衰，尤其对南浔镇市场机制的研究相当详细，2005年樊树志新作《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此书中有专门章节涉及南浔镇，是对前文进一步的扩充，论述时段从南宋一直延伸到民国，论述内容不仅涉及社会经济，而且也涉及了南浔镇的空间格局和人文色彩。

在国外，日本学者的江南市镇史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尤其是日本著名明清史专家九州大学川胜守教授于1999年





出版的《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空间与社会形成的历史学》（汲古书院，1999年）是这一方面的代表。此书第十章《清初庄氏史祸事件与南浔社会》专门涉及了南浔镇，此章中作者详引顾炎武、全祖望、翁广平的史料辩证庄氏明史案，说明清中央政府对地方社会的严酷统治，并详细描述了事件发生地南浔镇的社会环境，包括南浔镇的行政位置和四栅、明末清初南浔镇的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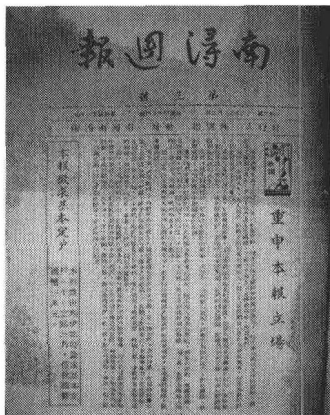
进入21世纪后，对南浔镇的研究从时段上看，更集中于近现代，涉及内容则更趋广泛，研究方法与视角更趋多样，史料也得到了新的挖掘。

其中朗友兴对南浔镇近代变迁的研究颇具代表性，发表了包括《镇政的现代化：南浔政治结构在近代的演进》（《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从南浔的变化看近代教育在江南市镇的发展》（《史学月刊》2003年第6期）、《“四象”的兴衰——一个江南市镇经济在近代的际遇与命运》（《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从传统走向现代——一个江南市镇社会结构在近代的嬗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等论文，从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方面较完整地论述了南浔镇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而另一位学者汪波则以《南浔社会的近代变迁（1840—1937）》（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12月）为题撰写了博士论文，此文以南浔蚕桑业的盛衰为线索，描述了南浔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变迁，分析了蚕丝业盛衰的内外因素，以及由蚕桑业盛衰而引发的南浔丝商群体的盛衰过程，进而讨论了南浔社会经济文化各领域的近代变迁，是一部有关南浔近代史的通贯性作品。此外还有陈可畏的论文《江南名镇南浔的近代命运》（《浙



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以及《上海开埠与近代南浔镇的兴盛》(《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6期)也涉及了南浔近代社会变迁的研究。

对丝商群体的研究是南浔近代史专题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陈永昊、陶水木通过多方收集资料,主编了《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南浔的“四象八牛”》(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一书成为了这方面研究最基本的史料来源。董惠民发表了有关浔商的系列论文,包括《近代浔商迅速崛起的原因探析》(《安徽史学》2004年第3期)、《论近代浔商衰落之原因》(《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4期)、《论近代浔商的新儒商特征》(《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较详细分析了浔商的崛起与衰弱的原因以及浔商的“新儒商”特征,此外涉及该课题的还有徐可、何妮燕、郑卫荣、蔡志新等人的论文(何妮燕《民国时期南浔富商群体迅速衰微的原因探析》,《江南论坛》2004年第12期;徐可《近代浔商文化人格探析》,《浙江学刊》2006年第2期;郑卫荣《清末南浔绅商群体崛起的历史再现》,《史学月刊》





2006年第9期；蔡志新《商人和近代南浔的社会变迁》，《江淮论坛》2007年第4期和《商人和近代南浔的地方自治建设》，《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对南浔近代文化的研究，也有学者论及，如李仲眉、汤以玲的论文从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分析近代南浔三大藏书楼——“密韵楼”、“六宜阁”、“嘉业堂”崛起的原因（可参看《近代南浔三大藏书楼及其成因初探》，《图书馆杂志》2004年第8期）；李天民的论文则论述了近代南浔私家园林崛起的原因，指出江南传统文化和当时外贸经济是清末民初南浔镇私家园林兴起的基础，战争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也为园林建筑提供了土地的便利，诸要素合力作用使南浔私家园林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古典私家园林建筑之晚霞。（可参看《浙江南浔镇近代私家园林崛起之研究》，《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从研究方法与视角来看，也有所开拓。有些学者使用了比较史学的方法，如彭南生与定光平发表了《近代市镇成长道路探析——南浔与羊楼洞的对比观照》（《江汉论坛》2004年第2期），此文试图通过对东南沿海与内地两个不同区域的典型市镇——南浔与羊楼洞的比较研究，来探讨近代市镇成长模式进而揭示近代乡村城镇化的某些共同性与差异性。洪璞则选取了太湖南部包括南浔的四个市镇进行比较分析，发表了《明代以来江南市镇的内涵与发展——太湖南部四镇的个案剖析》（《安徽史学》2005年第5期）一文，她认为市镇经济内涵的形成与市镇发生的历史背景以及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而市镇的经济内涵又决定着市镇发展前景。郑卫荣的论文《清末民初地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调适——以南浔绅商群体的政治参与为中



心》（《浙江学刊》2007年第2期）则主要是借鉴了“社会与国家”的理论内核，以清末民初的湖州南浔镇为个案，将地方社会（以地方权力主体为代表）与国家统治（以国家权力体系为代表）的总体性关系内化于区域史的实性分析中，通过考察南浔绅商群体的政治参与来勾勒地方社会与国家统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从史料发掘来看，除了地方志外，最重要的是馆藏于湖州档案馆的佚名《南浔研究》，此文是1931年浔中附小学生对南浔镇进行社会调查后撰写的调查报告。张建智、钟华根据这份报告，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南浔镇的社会状况作了详尽的描述，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南浔镇在经济发展、政治建构、文化教育设施与社会公益事业及交通通讯的建设上都处在全国的前列，成为江南市镇的典型，并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色，在南浔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商人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可参见张建智、钟华《20世纪30年代南浔镇的社会状况》（《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还有学者利用民间传说作为史料来论述南浔镇的成长历程，可谓新意盎然，尤其对南浔镇成长的时空脉络的分析与南浔镇起源问题密切相关，可参见小田的论文《民间传说的社会史内涵——以一个江南市镇的成长历程为依托》（《河北学刊》2006年第1期）。

自宋代以来，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经济中心的进一步南移，江南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其中的重要表现就是江南市镇的普遍兴起，因而江南市镇史在近二三十年的江南区域史以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已然成为一门显学，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该领域的缺陷与不足却依然相当明显。在既有成果中，虽有不少成